

# 古代笔记文初探

张惠仁

笔记文，是我国古代散文大系中的文体之一。它顾名思义，随笔而录，挥笔而记，即兴成章，因而造成了题材的少限制性和内容的最大丰富性。与其它散文体裁相比较，笔记文还有以下特点：

一是写作过程的自然性。人们写笔记文的初衷，大多不是为了立即公诸于世，而更多的是“录以备用”，因此，构成笔记文的“非刻意为文”，而能顺理成章的鲜明特点。

二是凝练透剔而可读性强。笔记文之内容，均为作者所见、所闻、所语之精华，是经过自觉思维过程筛选后，确认为有保留价值的思维片断、结晶，或某种线索。于创作，其可谓珍篋中的素材；于治学、理史，其可谓知识的积累，成功之舟楫。它的内容，总有着或远或近、或深或浅、或正或侧、或明或隐的意义。所以，有人赋予笔记文以“小百科知识丛著”的美称，这恐怕也是“不登大雅”之区区笔记文得以流传千古的第一奥秘。但是，作为一种文体，还必须在写作上别有一功，才能存在。笔记文在写作上的功技，正在于：它是于自然流笔之中，但见功底；寓可读性于凝练透剔的即兴小品笔法之中。非刻意雕饰，却有文道汇于自然之中的效果。作者的睿智与神来之笔，尽溢于寥寥几笔之中。其于记事，无矫赘；其于描写，人、事、景、物，则跃然笔下，淋漓尽致；其于辩证、析理，则一语中的，使人耳目一新；其于讽谕，则不直、不粗、不露，其意尽寓于写实之中；更有喜笑怒骂皆

成文章之技。

正因为上述特点，笔记文并非被诋言的那种“信笔涂鸭”的劣作，或仅为“雕虫小技”而已。应该说笔记文兼有历史的、文学的、科技的、应用的多方面价值。许多历史学的鸿篇巨著，莫不是历史性笔记文的总结与升华。许多文学家甚至一生都勤耕笔记文，如欧阳修、王安石、苏轼、陆游、顾炎武等。至于历史上的笔记文专著就更是蔚为大观了。所以，笔记文实在是我国文化宝库中的一种珍藏。近年来大量古代笔记文著作的汇辑与再版，便是明证。早在宋代，人们在谈论笔记文时，便有“虽为末学”，“尤务多闻”的评价（罗焯《醉翁谈录》）；清代刘熙载在《文概》中，也说笔记文“虽体不纯，意理颇有实用”。

## 笔记文的渊源和沿革

关于笔记文的渊源，其说不一。有的说，始于春秋（张学忠《古代笔记小品选读》）；有的说始于汉代班固《白虎通义》（刘叶秋《历代笔记概述》）；也有说始于魏晋南北朝或唐、宋的。这些不同的看法，恰好反映了古代笔记文渊源及其沿革中的客观的、内在的联系。任何一种文体的形成都是源远流长的，非但一种文体本身要有着一个过程，而且文体之间，还有着不可分割的相袭性与派生性。

要追溯笔记文的远源，应当从笔记之

法、笔记之制和笔记之官谈起。

笔记者，属文之始，为文之本。笔记法是人类写作的初试与基础性、习惯性的方法。遇事而记，是产生各种文体的基础。

及至我国奴隶社会后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史官制度被确立后，便实际上从法律的、政治的涵义上，肯定了笔记法的地位和作用。史官笏简在握，“大事书之于册，小事简牍而已”，于是便开创了笔记历史之先河。至于笔记历史之体拟，亦有所本，谓之“史之所记，以年首事”。再于笔记历史的笔法，亦有所规范：“一曰微而显”，“二曰志而晦”，“三曰婉而成章”，“四曰尽而不汙，直书其事，具文见意”，“五曰惩恶而劝善”（以上均见《春秋序》）。这些，都规范了《春秋》的笔法和体拟。凡记事，必先曰年、月、时，继而简言志事。或用一字（如“蝗”，示该年该地蝗灾），或用几字（如“公来朝”），简记国之大事。所以，《春秋》笔法的基本特征乃是以“笔记小品”之法，而微言“国之大事”、“经之大义”的。它具有即时而就、非刻意为文但以直书其事为尚，却又“婉而成章”的特点，其言不汙，其意尽达，遂成寓“微言大义”之旨于“一字褒贬”之中。这种基本的笔法，不但奠定了我国史书、记事文的基础，而更为我国历史笔记小品及讽谕性笔记小品所师法。这就决定了史官制度、史官记事之法、记事之文与历史笔记、讽谕性笔记在文体上及笔法上的渊源关系。我国早期历史鸿篇，可以说是历史小品的辑缀和升华；反过来，历史鸿篇的笔法，又决定了野史、补逸、琐记的笔法。这是一种客观存在着的内在的因袭关系。

《史记》的作者司马迁，从二十岁起就开始了他的漫游生活。“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以后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史记·太

史公自序》），足迹几乎遍历全国。在旅途中每有所见，必笔记之。继任太史令后，他更是开始了大规模的、系统的史料采集。这种笔记工作，一直进行到他四十二岁时，他才正式开始编修《史记》。所以，《史记》也可以说是司马迁毕生笔记之集锦与升华。此外，司马迁的生涯也证明了史官、史制、史书与历史笔记之间的渊源关系。

随着历史的发展，又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史官本身笔记内容的变化。史官不仅做历史笔记，也做丛考性笔记了；二是笔记作者队伍的变化。除了宰相、翰林学士、文学士、编修等写作笔记之外，一些文官或地方官，也都利用自己的工作之便，做起笔记文来了。如西汉刘向的《说苑》、《新序》，班固的《白虎通义》，西晋张华的《博物志》，南北朝时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唐代段成式的《酉阳杂俎》、张鷟的《朝野僉载》、李肇的《唐国史补》，宋代王安石的《神宗日录》、欧阳修的《归田录》、叶梦得的《避暑录话》、洪迈的《容斋随笔》、陆游的《老学庵笔记》、赵升的《朝野类要》、王应麟的《困学纪闻》，明代谢肇淛的《五杂俎》，清代王士禛的《池北偶谈》、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俞樾的《春在堂随笔》等，都是在这种历史背景及渊源传统下产生的。这些事实，再次雄辩地证明了“史”与“笔记”之间的渊源关系。当然，这只不过是笔记文产生、发展的渊源之一而已。象《梦溪笔谈》、《古今谭概》、《日知录》等著名笔记文专集，尚不在此例而另有渊源。

同时，还必须说明，在史官修史之初，笔记文尚孕涵于史著之中，从文体上、命名上、写法上都尚未独立出来。因此，史书也只能谓之远源之一而已。此外尚有两大渊源：

一是古代神话，如《山海经》、《穆天子传》等。后世之神话笔记、志怪笔记、传奇笔记、小说笔记等，均源此而生。

二是诸子手笔。《论语》，就是孔子门生对于孔子言教的笔记。《庄子·外物篇》中所提出的“小说”论，奠定了我国早期笔记小品、杂文、小说的理论基础。在庄子作品中，某些貌似怪诞的“小说”，是作为他朴素的宏观探索的论据而出现的，不能视同后来的笔记文，但“小说”论的提出及庄子的某些笔法，对于笔记文形成的内在影响，是不能忽略的。正因为如此，“笔记”和“小说”两种文体在古代是混为一体的，或谓之“笔记小说”，或谓之“小说笔记”。在诸子之中，真正实践笔记文直接尝试的，恐怕算是韩非了。《韩非子》的《内储说》、《外储说》，用笔记手法，辑汇了许多历史故事，其意图及体拟，颇有“储小说以备用”的特点。他用笔记的形式，为“小言”、“小说”、“小事”、“小道”、“小品”，创造了一个有效发挥其作用的为文形式——“储说”。更值得注意的是，“储说”之中，不仅涉及到言、人、事，而且有强烈的考证、驳辩的色彩。这对于后世之某些笔记文也是有深刻影响的。

先秦文章除上述几个源流外，对于后世科技性笔记文的形成有直接影响的，还要提到《礼记·考工》。

至汉代，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列举“小说十五种”，并强调了它们的“残丛小语”式的鲜明特点。其中所保留下来的篇目，已颇具后来笔记文的雏型了。是否可以设想这“小说十五种”正是笔记文的近源呢？这里，还应提到的是：班固的《白虎通义》在笔记史中，向被认为是考辨性笔记之初编，汉代刘向《说苑》《新序》和三国邯郸淳《笑林》的问世，都促进了笔记文体的独立化。

魏晋南北朝是一个文学探索的新时期，许多新兴文体都各扬其势。在这种情况下，又出现了“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的文学理论，于是无韵的笔记小品出现了第一次繁荣

的高潮。南朝宋临川王刘义庆及其门士所编《世说新语》的问世，可谓是当时笔记文兴盛、笔记文向“专集化”发展的标志之一。与此同时，志怪笔记与考辨笔记都更加活跃，甚至风靡一时，如当时出现的《搜神记》、《拾遗记》等，至今仍然被视为笔记文的重要作品。

继之，唐代的笔记文又出现了新的气象——历史的补逸、轶事、琐闻性笔记的兴起以及考辨性笔记地位的急遽上升。《隋唐嘉话》、《唐国史补》、《大唐新语》、《封氏闻见记》、《教坊记》、《因话录》、《桂苑丛谈》、《开元天宝轶事》等笔记专集的出现，标志着笔记文的独立地位及独特作用，已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了。

但是“笔记”二字作为文体名称、书籍的名称出现，已是北宋年间的事了。生活于公元998至1061年的宋祁，第一次正式用《笔记》二字作为他的笔记专集的名字。接着，苏轼又有《东坡志林》和《仇池笔记》。《东坡志林》发扬了笔记文“小百科”之长，其内容涉及经史子传、制度风俗、轶闻时事、山川风物、佛道修养、阴阳术数、梦幻幽怪等。但在写作上，东坡先生却自有所创，这种创造性主要表现在：其笔记，落笔成章，清新自然而富有审美价值，堪称古代笔记小品作品中最有代表性者；其游记小品，堪称后世游记小品之始。至南宋洪迈的《容斋五笔》（即《容斋随笔》），按《随笔》、《续笔》、《三笔》、《四笔》、《五笔》分集，强调了笔记文“笔”（区别于有韵之文）的特点，对于笔记文的独立化，也起了一定的作用。总之，笔记文至宋代已完成了文体独立化的过程，并且出现了空前繁盛的局面。

在宋代笔记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沈括所作的《梦溪笔谈》二十六卷、《补笔谈》三卷和《续笔谈》一卷。该书因写于润州（今江苏镇江）梦溪园而得名。沈括的笔记专集，从内容上讲，进入了一个新的“大观

境界”。单就《梦溪笔谈》而言，即有故事、辨证、乐律、象数、人事、官政、机智、艺文、书画、技艺、器用、神奇、异事、谬误、讥谑、杂志、药议等十七目，约六万条。内容涉及天文、气象、历法、数学、地质、地理、物理、生物、化学、医学、文学、史事、音乐、美术诸方面。至此，笔记文在内容上的“小百科”的特点就被集中而鲜明地反映出来了。《梦溪笔谈》文笔凝练、朴素而井然有序，寓文采于一定的科学性之中。还应该指出，《梦溪笔谈》中的相当一部分，可谓为我国古代科学小品的近源。

在宋代笔记文体独立、笔记文空前兴盛的总形势下，笔记文的流派与文体类型也开始呈现出来了。除上述有代表性的几家外，南宋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首开丛著性笔记之例。诚如阎若璩的儿子阎咏的题识中所说的那样：“或有问部书最便观者，谁第一？家大人曰：其宋王尚书《困学纪闻》乎！”可见其在当时的地位与影响。此外，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周密的《武林旧事》等，也各骋其长。

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散文的变革阶段，是古文向语体文的渐变时期，文学派别繁多，文体多有变革。在这种背景下，笔记文大有方兴未艾之势。当时，闻名者除明代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田艺蘅《留青日札》、张岱的《陶庵梦忆》等外，以冯梦龙《古今谭概》流传为最广。杨慎《杨升庵集》中的笔记部分，也有一定影响。而《日知录》（顾炎武著）的出现，在笔记小品史上则有划时代的意义，从此，丛考性笔记以其自身的价值而进入了大雅之列。清代王士禛的《池北偶记》，也是当时丛著性笔记文的代表作之一。

另外，清代还出现了专门以“读书笔记”为名的专集，如何焯的五十八卷集《义门读书记》、陈澧的《东塾读书记》等。特别是《四库全书》总纂官纪昀的《阅微草堂笔记》，其

中颇有精采之笔。鲁迅先生在评说时，指出它“于宋儒之苛察，特有讳言”。

总而言之，至明清阶段，笔记文非但在内容上丰富多采、数量上难以尽数，而且在文体、笔法上已另成一枝了。其规模正如徐应秋在《玉芝堂谈荟·序》中所说：“若夫包罗群象，总统万家，见见闾闾，列成巨丽，近代以来指诘数屈者乎？”

## 笔记文的分类

如前所述，既然笔记文有着“包罗群象，总统万家”之特点，也就带来了它在思想内容上的良莠并存、体裁杂糅、分类交叉等问题。本节单就其分类情况，略作分析。

回溯笔记文的远近之源及其形成的历史，不难看出，它在分类中实际存在着的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的笔记文，实际上指的是“笔记文学”，它以古小说、传奇、志怪、列异类为主（故古人称笔记文学为“笔记小说”。鲁迅先生在《古小说钩沉》中曾列举了三十六种），辅之以历史故事、野史、稗史、轶事、琐闻等（这一类，在笔记小说中，多取其富有情节者），另外，也不排斥丛著、辨证、杂考，但地位并不重要。狭义的笔记文，向被认为是狭义散文中的一种，故称为“笔记小品”。它不排除一定数量的、以小品形式出现的故事和幽怪之谈。但其地位远不如下列几种：

一、历史轶闻、野史、稗史、轶事、琐闻类，占据着笔记文的极大比重。这一类笔记有时标以“载”、“乘”为名，以突出其历史特点，如《朝野金载》、《窥天外乘》等。

二、丛著、辨证、杂考在笔记文中也占有很大比重，其中还包括读书心得在内。这一部分十分注重科学性，故有“裨海”之称。它们往往标名为“笔记”、“丛谈”、“杂

俎”、“漫话”、“漫钞”、“荟萃”、“客话”、“杂谈”、“新语”、“新序”、“世说”、“日札”、“广记”、“语林”、“类稿”、“书后”等等。这种分目与标题的传统作法，在今日之杂文中仍被保留着。

三、科技小品，其中包括对于古代自然现象的记载片断及技艺说明小品。

四、风土人情见闻录。

五、记叙、抒情小品，主要是于人、事、景、物的即兴抒写。以几十字或百余字见胜，如苏轼《承天寺夜游记》等，故有人称之为“袖珍小品”或“袖珍散文”。此类笔记常标为“记”、“闻”等。

六、述评小品，主要是对于历史人物和作品的评论以及艺术理论和创作原理的探索等，如《日知录》和《容斋随笔》的有关条目，陆深的《金台纪闻》，杨慎的《丹青总录》等。这类笔记，夹叙夹议，重在议评。

七、残丛小语辍记及其它。

当然，上述分类是有一定的相对性的。

## 笔记文的影响

笔记文的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

一、优秀的笔记文在明清时代，被指定为“钦定”必读书目。《日知录》便是其中的代表作。它是顾炎武一生严肃治学的结晶，正如他自己在《自序》中所说：“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日知录》共三十二卷。按史学、吏治、财赋、舆地、艺文等分类编入。引证及为文都十分严谨。就连《钦定〈四库全书〉提要》也承认“炎武学有本原，博瞻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佐证而启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非如杨慎、焦竑诸人，偶然涉猎，得一义之异同，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者。”宋荦在《序》中也说该书“或辨驳议论得失，或阐发各物源流，或直书时事，或旁及怪异，率皆情简而不浮。”还必须指出，《日知录》十分强调民族气节，其文学思想也比较进步。

二、优秀笔记文，在历史研究中被列为“正史”的补充和旁证，为历史学者所必读。如《扬州十日记》、《东林始末》、《三朝野记》、《避戎夜话》、《东南亚记事》、《三湘从事录》等，都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笔记文是古代传奇、话本、小说之源。鲁迅先生在《古小说钩沉》中，不但列举了《山海经》、《穆天子传》、《青史子》、《齐谐记》、《续齐谐记》、《博物志》、《搜神记》、《幽明录》等三十六种笔记小说，而且指出在笔记小说的基础上“唐人始有意为小说”，“宋初《太平广记》为小说渊藪”。鲁迅先生还专门以笔记文的形式，整理了《小说旧闻钞》。其间所收不乏有价值的论述。如《印雪轩随笔·二》：

《聊斋志异》一书，脍炙人口，而余所醉心者，尤在《阅微草堂五种》。盖蒲留仙仙才也，其所藻绩，未脱宋人小说窠臼；若五种，专为劝惩起见，叙事简，说理透，垂戒切，初不屑屑于描头画角，而教宣妙义，舌可生花，指示群迷，头能点石，非留仙所及也。

这里对笔记的评价，虽然有点过分，但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鲁迅的倾向性。

四、笔记文是研究文学家生平及文学评论的重要辅佐。如沈括在《梦溪笔谈·辨证》中，对于韩愈画像的考证：

世人画退之，小面而美髯，著沙帽，此乃江南韩熙载耳。尚有当时所画，题志甚明。熙载谥文靖，江南人谓之韩文公，因此遂误以为退之从。退之肥而寡髯。元丰中以退之享文宣王庙，耶所画，皆是熙载。后世复不可辨，退之遂为熙载矣。

又如宋代何筮《春渚纪闻》中，专辑了《东坡事实》，其中提供了苏轼佚文、佚事以及苏轼与秦少游、刘贡父、黄鲁直、陈无己、张文潜等交往的宝贵资料。

五、笔记文是我国小品文之源。“小品”之词，本源于国外。公元四世纪时，鸠摩罗什翻译《般若经》，将二十七卷的详译本称为《小品般若》，将十卷略译本称为《小品般若》。此后遂有“六朝小品”、“唐人小品”之说，但这时尚非专指笔记文。明清时，出现了专以“小品”命名的笔记专集，

“小品文”也专指随笔杂感一类短小文章。清代以后，小品文的种类繁多起来，逐渐代替了笔记文这一名称，但它们实为一体。其后也有称小品文为杂文的。小品文在我国现代文学中占有重要位置。鲁迅先生指出：“五四”以来，我国小品文的成功是在小说之上的。直到现在，笔记之法仍为现代散文的基本笔法之一。

六、笔记文是研究我国古代文体史的重要资料。早在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就在他的《归田录》中，申述了他对笔记文的见解：

唐李肇《国史补·序》云：“言报应，叙鬼神，述梦卜，近帷箔，悉去之；纪事实，探物理，辨疑惑，示劝戒，采风俗，助谈笑，则书之。”余之所录，大抵以肇为法，而小异于肇者，不书人之过恶，以谓职非史官，而掩恶扬善也，君子之志也。览者详之。

欧阳修的引证及阐述，颇为后世研究笔记文者所重视。他提出了笔记文与历史的区别与联系，也提出了笔记文的题材领域问题及写作原则，在《唐人奏事》一则中，他对于古之“表”、“状”、“榜”、“录”、“札”，“咨报”等体，均有考证。以后明代王世贞的《觚不觚录》和清代王士禛的《池

北偶谈》，对于“疏”、“尺牍”、“起居注”、“八股”等文体均有考证。

七、笔记文也为研究学科史提供了重要依据。前述之王士禛，曾官至翰林院侍读，刑部尚书。他的《池北偶谈》是他数十年“偶有见闻，笔之简策”的成果。其中宝贵资料甚多，如《日讲》介绍了我国古代最高权力机构内的讲学制度；《琉球入学》、《台湾府县》、《台湾开科》等条则为证明中国古代版图的重要资料。此外，《朝报》一条也很值得注意：

今之日报，或曰邸报，亦有所本，见王明清《挥麈录》，起自《朝野类要》云：朝报日生事宜也，每日门下省编定，请给事判报，方行下都进奏院投行天下，其有所谓内探、省探、衙探之类，皆畏私报，亦有密泄之禁，故隐而号之曰新闻。盖自宋时已然。又六科给事中，号晚帖，以当晚即知之，次日乃登邸报，故曰晚帖。亦有小报，谓之小抄。

这则笔记，对于我国的报刊起源和新闻定义都有精辟的考证，历来被我国新闻界的研究工作者尊为研究“古代新闻学”、“中国新闻事业史”的上乘理论和依据。

又如沈括《梦溪笔谈》及王士禛《池北偶谈》中所记载的我国历史上几次著名大地震的资料，均为研究“中国古代地震史”和“中国地震集例”之重要例证。

总之，笔记文既有“小百科”特点，又具有“大观”之势，因此，其影响必波及“百科”。所举必有“挂一漏万”之嫌，故权此驻笔。

（上接第105页）

这种教法是否能适应于阅读课文的教学呢？我们觉得也是可以的，因为阅读课文多半是讲读课文的基础知识的运用和补充。从运用的角度说，它们有相同之处；从补充的角度说，它们又有不同之处。这些相同之处和不同之处综合起来，便构成了一个单元的统一要求。如果我们在课文研讨阶段，以引导

学生理解课文后面的“思考和练习”为中心，发掘和归纳出了它们之间的联系，又侧重辨清了彼此之间的区别，则阅读课文的教学任务就可算初步完成了，整个单元的教学任务也可算初步完成了。余下的任务，就可在复习练习和效果考查两个环节和以后长期的学习实践中去完成。